

“双减”背景下学生减负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

顾恬瑞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双减”教育改革的推进下,作为参与者的学生,在心理和行为都体现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抗阻。“双减”背景下,学生减负的政策现状上兼顾国家顶层设计和地方基层探索,客观现实存在博弈论视角下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加之,教育系统诸如教师素质、学习内容和教育评价体制等内部因素,社会系统诸如社会观念、市场利益等外部因素,学生行为诸如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则指导和教育内卷下的阶层跃迁等综合因素影响。试图从打破“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思维逻辑、修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改善“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国民性格三点突破学生减负现实困境。

关键词: 双减; 学生减负; 囚徒困境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Reducing Students' Burden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and Its Breakthrough

Tianrui Gu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Abstract: As the "double reduction" education reform progresses, students, as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are embodying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barriers to the reform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current policy situation of student burden reduction balances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and local grassroots exploration, 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a prisoner's dilemma of student burden reduc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Also,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learning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attitudes and market interests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behaviour such as the guidance of unchanging norms and class leap in the education in-volum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eak the logic of "don't lose at the starting line", revise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is inferior but reading", and improv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although th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re foolish, the scriptures must be read"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reducing students' burden.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Burden reduction of students; Prisoner's dilemma

实施教育改革旨在促进教育进步,最终落实立德树人,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教育。2021年7月,国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正式颁布,义务教育阶段新一轮学生减负正式开启。不断推进的减负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现实困境,涉及困境的群体包括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在诸多发难下,教育对

象——学生关于减负的心理、行为及其原因,基于此如何突破困境值得关注。

一、学生减负的现实困境分析

“双减”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主要集中于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指明了学生减负一直以来难以真正落实的窘境。新时代教育中学生减负的现实困境体现在多方面,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 兼顾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政策支持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以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国家层面出台的重大减负政策有数十个之甚,1955年由国家

作者简介: 顾恬瑞(1998-),女,汉族,江苏省南通市,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颁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起，到2021年7月国家统一颁布最高层级的减负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期间，教育部等部委在2018年12月联合颁布《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制定详细的配套方案。随即，兼顾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减负方案相继出台。

愈加丰富的减负文件体现了教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一次次寻找新出路，既破又立。教育改革历来坚持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彰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在教育观念上，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在课程设计上，细化课程内容、课程监管、课程评价等流程；在教学执行上，深入注重教育规律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扩大教改范围的同时，使科学减负真正落实到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

政策话语上，从单一“减负”到“减负增效”、“减负提质”再到“双减”；政策制定方面，注重中央文件、寻求地方表达，兼顾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地方政府的基层探索。对应到现阶段我国主流采用的科学且可测量的学生课业负担指标系统逐渐丰富。课业负担被理解为客观负荷时，指标以学生客观负荷为主，包括学生在校时间、教辅材料数量、作业内容、考试频率、睡眠时间、课余活动安排等；课业负担除了客观负荷外，还要考虑学生主观感受时，调查中关注学生对课业难度、学习劳累或愉悦程度、压力大小等指标^[1]。

（二）博弈论下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

2022年3月，新华社联合百度发布《大数据看2020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教育改革”位列第三。教育改革实施以来，学生减负一直是全社会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且尚且存在问题。学生如何减负不单是教育领域内的问题，更是为社会问题。因此，学生减负既体现在应试、素质层面，又体现在社会层面。同时，参与各种教育活动的不仅有教师、学生、教育影响三要素，教育行为涉及其它各个方面，这是一个长期动态进行的、相互产生影响制约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博弈过程。

“囚徒困境”指两个被捕囚徒间的一种特殊博弈，即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如果都不揭发对方，则因证据不确定，每人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人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互相揭发，而非同守沉默。“囚徒困境”是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

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假设站在学生甲的立场看四种情况。一，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自主选择增加课业量时，学生甲减少课业量，学生甲相应时间段内应试成绩可能不如其他学生。二，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自主选择增加课业量时，学生甲跟随增加课业量，教育内卷现象出现。三，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和学生甲都采取减负行为，学生应试成绩暂时不变，将会从其他因素寻求突破。四，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减负，学生甲自主选择增加课业量，学生甲相应时间段内应试成绩可能比他人理想。情况四对学生甲最有利，即自主增加课业量的同时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采取减负行为对学生最有利。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采取减负行为是不可控因素；自主增加课业量是可控因素，因此学生通常采取的是“增负”行为。根据“囚徒困境”对所有情况的推演，情况二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推演下，学生甲和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均采取“增负”行为是教育博弈的“纳什均衡点”。不患寡而患不均，“增负”渠道泛滥不得到控制，学生的“囚徒困境”博弈将依然存在。学生们只要是还对未来或事业前景有着一定的理想与精神追求，无论出于何种内驱力，都会自觉或不自觉要选择“增负”行为来应对竞争者的未知选择。

二、学生减负困境的成因分析

课业负担涉及教育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从教师、教材等到习俗、竞争等各个方面，其成因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梳理学生课业负担成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内因解释、外因解释。

（一）课业负担内因解释

课业负担的内因解释即通过寻求教育系统内部的诸如教师素质、学习内容和教育评价体制等因素的解释^[2]。

一是教师素质方面，教师素质提升最为重要的一环——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当教师已经不足在规定课堂教学时间内完成既定教学任务，就会出现额外的教学填补现象，例如延长教学时间、增加课后作业；或教师教学观念落后，采用“填鸭式”教学，坚信以量提质。

二是学习内容方面，课程内容学习难度大，超出学生预先支配在学习的时间，如果不加班加点容易输在起跑线上；或学习标准高，常听到学生家长抱怨现在的题目难度远超从前的学习标准。

三是教育评价方面，教育评价标准应试、不灵活，引发学生在分数上形成过度竞争。考试太频繁或考试成

为主要的衡量指标,都将在无形中加大学生学习压力。

(二) 课业负担外因解释

课业负担外因解释即通过教育外部的社会系统诸如社会观念影响、市场利益驱动等因素。

一是社会观念影响方面,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提倡苦读。传统文化不同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对“苦读”无严格褒贬区分。“苦读”的传统目的—般是社会越级逻辑“学而优则仕”,既有的崇尚读书心态并崇尚通过读书改善自身处境。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个人期待,“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国民性格,学生因此被迫加大学习强度。

二是市场利益方面,认为自由竞争带动利益驱动。看不见的手推动了一些相关社会利益者通过开办各类学生课外辅导、发行各种图书教辅等逐步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自愿的、非自愿的课后学习从时间上压榨、在心理上加剧学生学习压力。这也是2021年7月“双减”政策公布、落实的主要原因。科学厘清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职责,系统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3]

(三) 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学生行为

1. 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则指导

人生是单行道,一旦做出了决策难以悔棋。一方面博弈论视角下,出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学生个体和群体规避冒险倾向于选择“增负”策略来应对其他竞争者的任何可能的选择。考试竞争的影响下,不少教育改革常常会出现两种近乎于宿命性的结局:一是虎头蛇尾;二是半途而废。^[4]这两方面的加持造就了高保障的增负策略难以撼动的地位。

单方面减负可能引发大概率不良风险、对教育风险的担忧以及对教育改革前景的不信任,造成学生群体普遍以不变的“增负”策略应对错综复杂的教育信息,使得“增负”策略成为万全之策,也使得既往减负策略偃旗息鼓。

2. 教育内卷下的阶层跃迁

阶层跃迁肩负代际间传递、复兴的使命,家长希望孩子既能学好又能快乐学习。无温饱之忧的白领与知识精英关注的可能是改革后的教育能否最大限度地挖掘孩子的潜能、发展孩子的健全人格;而经济困窘的农民与下岗工人介意的可能是改革后的教育能否减轻家庭的教育经费负担。^[5]

教育内卷大环境下,现行趋于固态的社会、文化模式在当前发展阶段停滞,教育较难转化为另一种螺旋

上升的模式。对弱势群体而言,往往会选择通过增负取得良好成绩进而获得丰厚社会资源缩小与优势群体间差距,实现阶层跃迁;而对较优势群体而言,在教育方面的额外消费是学习时间分配不足、学习效果不理想的解决方案。

因而相当一部分学生无论出于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或远景的间接性动机,亦或是追寻自我价值或外部刺激,都趋向于选择“增负”行为,造成学生减负现实困境。

三、学生减负困境的突破

“规范化社会影响”指一种基于个人被别人喜欢或接纳的期望的社会影响,可以导致从众现象;“信息性社会影响”指把他人视为指导行为的信息来源从而顺应其行为。学生减负面临困境的成因来源多方,既有传统认知因素也有既存现实因素,既有历史社会因素也有现代经济因素,既有客观环境因素又有主观选择因素。传统心理、环境倾向、群体价值观属于规范性社会影响,家长指令、营销话语、既过独木桥者经验是信息性社会影响。基于此,突破学生减负困境的着手点有以下几个。

(一) 打破“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思维逻辑

格塞尔双生子爬梯实验说明教育需要尊重孩子发展的具体实际水平,不要违背每个孩子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从实验结果看,尽管A比B早训练7周,训练时间也是B的3倍,但是在56周和3岁时,A和B的爬梯成绩相似。过早的教育并不能让孩子一直在赛道上保持赢的姿态。

起跑线思维意味着只能看到人生赛程某一部分,并将这一部分赛程成绩定格和夸大为人生最终成绩。人整体的发展不能用比赛衡量,更不能仅仅依靠计时判断人整体的发展水平。因此,起跑线理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二) 修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明教育实质,即应尊重孩子自然天性。教育过程的最终教育目的是育“人”,不是工业化成批次地产出成品,教育是一种需要教育者根据孩子各自特点、自然天性因材施教的过程。先成“人”后成“才”。

社会约定俗成的成人、成才是要求具备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源、享受一定高度的社会地位。殊不知,成人是能成为一个思想富足的人,不至于是一尊被锁在神龛里的侍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做自己,做自己会获得多大的力量。通过一种比较沉静的、温和的方式,在浆

声灯影的时代里,看见那些晃动的桨声和灯影,厘清内心真正的诉求,而非一味地“求仕”。

(三)改善“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国民性格

对作为一个承受中华儒家经典思想熏陶了数千年并形成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的国民群体来说,改革与更新需要巨大力量打破惯性,分解并重组自身感性和理性,内化和积淀出一种坚韧的社会自觉,也必然需要一个相当成熟的、斗争的思想更新与时间包容。

四、结论

学生在减负中持“赞同”之态和行“拒绝”之事,是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教育改革者也已予以注意,并已主动触及,开始提出了多层次问题设计,努力寻求问题深耕和解决。争议现象本身恰恰说明当前教育改革的确处于一条具有曲折性、复杂性、价值性和阶段性特点的漫长道路,可以帮助义务教育改革事业健康良性前行。

因此,关注矛盾争议、关注异己意见,可以帮助教

改在探索过程中孜孜矻矻逐渐修正顶层设计,以此结合基层实际,寻找更适配自身的改革路径,最终做好学生减负。

参考文献:

[1]胡惠闵,陈国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问卷的编制[J].全球教育展望,2016,45(04):25-44.

[2]周兆海,邬志辉.理性冲突与调适:中小學生课业负担难减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36(11):19-21.

[3]张海鹏,张新民.“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理念转型与制度优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3):150-156.

[4]吴康宁.制约中国教育改革的特殊场域[J].教育研究,2008(12):16-20.

[5]吴康宁.谁支持改革——兼论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06):1-5.

